



全国高职高专**公共基础课**规划教材

文学欣赏

阮 航 主 编

曾 杰 吴德利 史 迹 副主编



赠送
电子课件

清华大学出版社



全国高职高专公共基础课规划教材

文学欣赏

阮航 主编

曾杰 吴德利 史迹 副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拓宽学生文学视野、提升学生文学欣赏能力为目的，从文学宝库中撷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对其进行介绍、剖析和鉴赏。

本书分为三章：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其中作品都是中外文学的一朵朵奇葩，选文视野开阔，鉴赏角度新颖。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各专业人文知识普及的教材，也可作为社会青年提高文学修养的读物。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欣赏/阮航主编；曾杰，吴德利，史迹副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8
(全国高职高专公共基础课规划教材)

ISBN 978-7-302-23006-9

I. ①文… II. ①阮… ②曾… ③吴… ④史… III. ①文学欣赏—世界—高等学校：技术学校—教材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5858 号

责任编辑：刘建龙 桑任松

装帧设计：山鹰工作室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北京密云胶印厂

装 订 者：北京市密云县京文制本装订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260 印 张：13.75 字 数：328 千字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23.00 元

产品编号：033860-01



人文素质教育对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我国而言,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固然存在着资源短缺、人口膨胀、就业压力等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大“瓶颈”是国民素质问题。国民素质越高,奋斗精神越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越快。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具有专业技术知识、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得到发展、能适应急遽发展的社会的要求的高素质人才,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任务。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社会伦理、准则)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人文素质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促进其成为思想、文化、业务、身体、心理素质等方面和谐发展的优秀人才。

无疑,文学欣赏是人文素质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学欣赏课是高等院校开设的一门重要课程,它主要通过对古今中外名作的赏析,使学生感受到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通过作品的感染力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健全的人格。文学欣赏课为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为学生人文素质的发展奠定基础。

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承载着对社会、人生的巨大关注和关怀,表现出作家鞭笞丑恶、探求光明、拯救芸芸众生的人文情怀,折射出民族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传达出人类对假丑恶的痛恨、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大自然的美丽和谐、神秘伟大,呈现的幸福生活、美好人生,曾激励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走出迷茫、摆脱困境、创造辉煌,曾提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境界。读者阅读这些文学作品,将同样受到人性的洗礼和感化,人文素质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培养和提升。

21世纪的大学生面临高科技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转变等诸多变化,其身心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因此,在注重培养其专业能力的同时更需要提高其人文素质,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今后的职业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编写了这本书。中外文学浩如烟海,本教材在有限的篇幅内,不可能包罗万象,面面俱到,仅从几千年的中外文学中采撷菁华,筛选出三十七部作品,以拓宽学生的文学视野,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训练学生阅读、欣赏中外文学作品的 ability。

由于本书编著对解读作品的角度、编著者的兴趣、文化知识等诸多因素影响到执笔者对作品的鉴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非常感谢全体编者,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耐心细致的工作。



本书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治田
阮菲
何桂娟
罗凌云
高节慧

王伟轩
李兰
张会君
武金巍
梁碧波

宁阿玲
刘玥
张迪
贾立莹
蓝露璐


刘玉珺
李如彬
罗丽
贾婷
潘晓宇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古典文学	1
第一节 苇叶露珠上的诗行——《诗经·国风》撷华	1
第二节 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司马迁与《史记》	7
第三节 绮丽与迷思的交融——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11
第四节 朦胧多义的心灵世界——李商隐的《玉溪生诗》	17
第五节 书写女性的生命本真——李清照的《漱玉词》	23
第六节 在爱与美中彰显人性光辉——王实甫的《西厢记》	29
第七节 民族正义的诗性书写——纪君祥的《赵氏孤儿》	35
第八节 奇思丽词 至情绝唱——汤显祖的《牡丹亭》	40
第九节 百变人生 市井镜像——冯梦龙的《喻世明言》	46
第十节 寓“孤愤”于“异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52
第十一节 浓缩封建社会的衰亡史——曹雪芹的《红楼梦》	58
 第二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	65
第一节 乡土情结与现代性渴望之间的困惑——鲁迅的《故乡》	65
第二节 永远的田园梦与理想化的现代改造——沈从文的《边城》	70
第三节 挣不脱的旧中国梦魇——曹禺的《原野》	76
第四节 悲凉的现代中国意象——老舍的《月牙儿》	81
第五节 新老帝国双重压迫下的中国女性的哀音——萧红的《呼兰河传》	86
第六节 宗法社会诉讼与社会阶级斗争——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	91
第七节 武侠小说与革命史话的完美结合——曲波的《林海雪原》	96
第八节 当代青年的成长寓言——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101
第九节 陷落在深度意象里的致命飞翔——海子的诗歌	106
第十节 恢弘绚丽的现代民族史诗——陈忠实的《白鹿原》	114
第十一节 自由思想者的浪漫传奇——王小波的《万寿寺》	121
第十二节 现代城市的性别史诗——王安忆的《长恨歌》	127
 第三章 外国文学	133
第一节 欧洲叙事诗的典范——《荷马史诗》	133
第二节 跨越千年的文坛巨著——《源氏物语》	139
第三节 古代阿拉伯文学的最高成就——《一千零一夜》	145
第四节 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的杰作——《神曲》	151
第五节 欧洲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作——《十日谈》	156
第六节 荒原中的爱恨情仇——《呼啸山庄》	161
第七节 含露欲滴的草叶——《草叶集》	167



Contents

第八节	浪漫主义爱情理想的破灭——《包法利夫人》	173
第九节	揭露社会问题 剖析犯罪心理——《罪与罚》	179
第十节	震撼灵魂的人性剖析——《竹林中》	185
第十一节	东方给予西方最美好的礼物——《先知》	189
第十二节	叙事艺术的精华——《老人与海》	194
第十三节	真实和荒诞的交织 传统和现代的融合 ——《铁皮鼓》	199
第十四节	通俗小说与严肃文学的完美结合——《我的名字叫红》	205
	参考文献	210

第一章 中国古典文学

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诗性智慧的结晶。本章主要选择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以申管中窥豹之意。《诗经》是古典文学的扛鼎之作，而“国风”则是其精华所在。《史记》既是一部历史典籍，又是一部文学巨著，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代表着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春江花月夜》以诗美享誉文坛，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诗的魅力。李清照词清丽婉约，可视为古代女性文学的典范。元杂剧《赵氏孤儿》和《西厢记》分别是古典悲剧、喜剧的代表作，而明代传奇剧《牡丹亭》则以艳异的爱情叙事横空出世。《喻世明言》是“三言”第一本，开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之风气，《聊斋志异》则如一抹瑰丽的晚霞，烘托出文言短篇小说的华丽结局。将它们和《红楼梦》联系起来，可以粗线条地把握中国文学的演进轨迹，重拾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记忆。

第一节 苇叶露珠上的诗行 ——《诗经·国风》撷华

《诗经》是春秋时期编成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 11 世纪)到春秋中期(公元前 6 世纪)约 500 年间的诗歌 305 篇，分风、雅、颂三部分。尽管年代久远，语言古奥，但它却以高度的艺术价值，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国风”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全诗集中数量过半，而且在内容上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充满了美刺比兴的现实主义精神，因而历来被认为是《诗经》的精华所在。

国风共 160 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 15 个地方的民间歌谣，其中周南诗源于周王畿，但杂有南方诸侯国的诗歌；召南诗则来自南方诸侯国。对于“风”的概念，《毛诗序》的解释是：“风，风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宋代郑樵在《通志序》中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①宋代朱熹认为，“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②简言之，“风”就是指民间歌谣。

国风大多数是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是从上千首民歌中采集精选而来的。周代设有采

① 郑樵. 通志二十略. 上海: 中华书局, 1995: 第 5 页.

② 朱熹. 诗集传.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第 1 页.



诗官专司民歌采集，其意图在于观风俗、知得失，服务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尽管这样，却为后人保留了大量具有原始风貌的民歌。在这些作品中，不仅有大量质朴、热烈、优美的婚恋诗，揭露社会黑暗和贵族丑恶的讽刺诗，还有不少歌唱生产劳动、抒发爱国激情、表达人生感慨的诗篇，它们植根于人民生活的沃土上，犹如从苇叶上流出的露珠，给人们带来清新纯朴的气息。从总体上看，国风以抒情言志为根本特征，而美刺比兴则是其思想艺术上的突出特点，它为中国古典诗歌开辟了现实主义道路。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诗经》就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孔子认为《诗经》有兴、观、群、怨、博物广识诸功能(《论语·阳货》)，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从具体内容看，孔子针对的主要是国风，因为雅、颂并不具有“怨”的思想内容。汉代学诗解诗蔚然成风，盛传齐、鲁、韩、毛四家诗，其中独以《毛诗》传世，其解诂为历代学人所传承。随着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名世，人们习惯上将《国风》与《离骚》并称“风骚”，这个词已成为古典诗歌乃至整个文学的代名词。进入全球化时代，国风古歌仍没有失去其应有的魅力。作为华夏先民的艺术创造，国风的诗歌意象具有原型意义，它渗透在古典诗歌传统之中，从而内在地影响着人们的修辞表达与审美认知方式。围绕《诗经》释读而形成的传统诗学理念，对于人们认识中西文化的互渗与碰撞，对于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当代诗学，都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二

国风基本上是四言句，以抒情诗为主，也有比较典型的叙事诗。从诗歌内容来看，它主要包括婚恋诗、农事诗、政治诗、感怀诗四种类型，它们是后世同类诗歌之本源。

如果说雅歌是朝堂上的官方文学，颂歌是献给神明的宗庙祭祀文学，那么国风就是带有浓厚泥土气息的民间文学。如果按“三才天地人”的传统说法，则颂歌是天之歌，雅歌是地之歌，国风则是人之歌，是劳动者的生活之歌、心灵之歌。

《诗经》的第一篇就是《周南·关雎》，这是一首优美热烈的情歌，它昭示着婚恋诗在国风中的重要地位。婚恋关系到人口繁衍、血缘世系和生活幸福，不论周朝贵族还是普通民众，都是把它作为终身大事来对待的。国风婚恋诗可以大致分为追求篇、结婚篇、家庭篇三个层次，它们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系统，突出表现了先民热爱生活、追求爱情、憧憬美好人生的思想感情。追求篇以《关雎》为代表，在这首热烈欢快的诗歌中，水汽迷濛的河洲、欢快鸣叫的水禽、长短参差的荇菜，构成了清新迷人的意境，其间回荡着“君子好逑”的款款深情。水禽鸣叫暗示求偶心切，“琴瑟”、“钟鼓”则表现了对婚庆狂欢场面的想象。结婚篇充满了热烈、喜庆的气氛，如《周南·桃夭》反复用“桃之夭夭”起兴，艳丽的桃花烘托出婚庆的热烈，衬托了新妇的美貌，而“宜其室家”的复叠咏叹，则充满了对新人的祝福。《唐风·绸缪》是贺婚歌，其“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句，充分显示出新人的激动心情。家庭篇通常表现夫妻深情，《郑风·女曰鸡鸣》就是其中充满温馨的篇章。作品撷取夫妻之间的生活小镜头，妻说鸡叫了，催夫早起打猎，夫却说天还没亮；妻又说启明星出现了，夫这才出门去“弋凫与雁”。





国风婚恋诗表现的内容并不都是幸福温馨的，不少诗篇反映了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徭役兵役破坏家庭生活、礼教伦理压抑人性的社会现实。在《郑风·将仲子》中，女孩面对恋人的大胆追求，却“畏我父母”、“畏我诸兄”、“畏人之多言”，“三畏”表明，男女交往已开始受到来自家庭、周朝礼仪的制约。《豳风·伐柯》中有“取妻如何，匪媒不得”的句子，可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俗已有十分古老的历史。有些诗反映了妇女的屈辱处境与反抗情绪，如《召南·行露》写女主人公面对男子的强娶要求，一方面揭露了对方“谁谓女无家”的无耻，另一方面表明了“虽速我讼，誓不女从”的决绝态度。由于频繁的徭役兵役，产生了征夫思妇这一社会群体，国风的一些诗篇就表现他们的痛苦与感伤。《卫风·伯兮》写思妇，她因丈夫远去而无心打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豳风·东山》写征夫，他当兵多年后在细雨中返回家乡，想起“妇叹于室”，故园荒凉，不禁产生了“我心西悲”的感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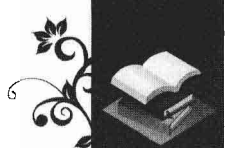
国风的农事诗是先民生产劳动情景的全景展示，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民众的生活方式。《周南·芣苢》写采芣苢的场面，只见满山遍野的芣苢开花结籽，妇女们边采集边歌唱，从“采之”、“掇之”、“有之”的轻快动作中不难想见其欢快心情。“芣苢”即车前子，民间用来疗疾。《魏风·十亩之间》写采桑劳动，表明养蚕织帛是华夏祖先的伟大发明。《齐风·还》写两位猎手在山间相遇，他们一起“驱从两狼”，有收获后相互道贺。《郑风·叔于田》夸赞猎人能饮善射，他一出行，小巷就再无好男儿。如同婚恋诗一样，农事诗也有美有刺。对于劳动成果被统治者掠夺夺取的残酷事实，诗人充满了沉郁愤懑。《豳风·七月》以时令为序，分别叙述农夫春播、采桑、绩麻、收割、打猎、酿酒、修房、凿冰、献祭等农事活动，尽管一年累到头，却“无衣无褐，何以卒岁”。魏风的《伐檀》和《硕鼠》则对掠夺者进行质问，《硕鼠》把他们比作专事窃取的大老鼠。

政治诗包括政治讽刺诗和政治抒情诗两类，前者刺淫刺虐，后者张扬爱国激情。《邶风·墙有茨》、《齐风·南山》、《陈风·株林》等诗篇，把讽刺锋芒直指卫宣公、齐襄公、卫灵公等人的荒淫丑行，诅咒他们“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唐风·鸛羽》写人民对无休止的“王事”不堪忍受，发出了“悠悠苍天，曷其有所”的悲怆呼号。《邶风·北风》则在北风呼啸、大雪漫天的背景下，勾勒出百姓“携手同行”躲避暴政的画面。《秦风·无衣》是政治抒情诗，表现秦国民众踊跃从军抗击西戎的感人场面，他们虽没有军服甲冑，却以“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相勉励。《邶风·载驰》表现许穆夫人“归唁卫侯”的爱国行为，在卫国被狄人灭亡的危难关头，她打算冒险慰问卫侯，并向大国求助，却遭到众大夫的谏阻。作品把许穆夫人和“大夫君子”的言行加以对比，从而表现了一代女杰的过人胆识。据清人魏源《诗古微》考证，此诗及《泉水》、《竹竿》均为许穆夫人所作，因而她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女诗人。

感怀诗主要抒发个人的人生感喟，或忧国伤时，或岁末抒怀（注：抒怀也作书怀，如杜甫的《旅夜书怀》），或咏叹个人际遇。有的诗意绪朦胧，甚至具有象征意味，例如《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通常人们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但诗中“伊人”并无实指，他(她)既可以是恋人，也



可以是友人、亲人、有德之士，或者是某种难以实现的理想和愿望。“道阻且长”、“宛在水中央”也是这样，可以指爱情的阻力、人生的困惑、理想的遥远，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

由于国风诗年代久远，其土风方言也有意义模糊之处，这就使说诗解诗成为旧学中的一种学问。古人解诗通常以“温柔敦厚”作为价值标准，喜欢用儒家伦理来比附其象征意义，如认为《关雎》是美后妃之德，《蒹葭》是刺襄公不用周礼。在今天看来，这类解释已经陈旧过时。因此，理解国风的意蕴，既要吸收前人有价值的看法，又要脱离其陈旧的伦理话语，从而把握诗中折射出的历史真实与情感真实。

三

创造赋、比、兴表现手法，是《诗经》对中国古典诗歌作出的杰出贡献。过去，人们将赋比兴与风雅颂并称“六艺”，其实，风雅颂只是诗歌内容和功能上的分类，赋比兴才是表现手法。三种手法在风雅颂中均有广泛运用，但国风显得更亲切自然，生动鲜活。正因为这样，人们才用“采风”、“风人之旨”来指称诗歌创作。至于赋比兴的内涵，前人的解释可谓大同小异，基本达成了共识，宋儒朱熹的解释有一定的代表性。

朱熹认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可见赋就是直接叙述或描写，具有再现人物、事件或情景的功能。具体来说，赋的特点有三：首先是赋具有叙事的直接性，即直接陈述事实，并不迂回曲折。例如《郑风·狡童》是民间情歌、抒情诗，但诗中有简单的事件，即恋人“不与我言”、“不与我食”。诗人把这些无所顾忌地直接说出，表现了少女感情热烈和偶尔撒娇的个性。其次，赋具有铺陈性，就是把事件过程尽量叙述得充分细致，从而使事件显得具体、生动、形象。例如《卫风·氓》从对方求婚写起，然后叙述家庭生活的贫困，被对方抛弃的痛苦，女主人公把何人、何事、何地、何时、何因、何果这些叙事要素都作了交代，是一篇叙写妇女被遗弃遭遇的叙事诗。第三，赋具有兼容性，不仅适用于抒情诗或叙事诗，还可以兼容描写、抒情、议论等表现手法，寄托讽喻意义，例如《郑风·清人》全用赋的笔法，叙郑文公派高克驻军黄河边上兵散而归事，潜含讽刺意味；《卫风·氓》的“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句虽直叙时令变化，但也起到了以景衬情的作用。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比就是打比方、比喻。国风中的喻象大都取自先民的生活环境，显得朴实生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例如《齐风·南山》句：“南山崔崔，雄狐绥绥”，诗人把齐襄公比成求偶乱转的雄狐，对其淫乱行为进行讽刺挖苦。《周南·螽斯》用蝗虫比喻子孙繁盛，设喻夸张而幽默。有时诗人还使用博喻手法，即通过反复用喻，把对象渲染得如浮雕般鲜明生动。例如《卫风·硕人》这样描画庄姜的美丽华贵：

手若柔荑，肤若凝脂，领若蝤蛴，齿若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诗人接连使用了六个奇特喻象，工笔重彩地描绘出人物的美丽。在描绘完形体后，再由实而虚，点睛传神。这种写法，为讲究形神兼备的古代美学提供了创作范例。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即先从别事、别景、别物起咏，然后引出





抒情意旨，这是民歌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表面看来，“兴”涉及的景物似乎与诗歌主旨关联不大，其实它对诗的意味生成至关重要。析而言之，首先，兴可以由此及彼，积聚联想。《关雎》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起兴，河边水禽看似与君子求偶相去甚远，但水禽通常雌雄终生相守，这让诗人产生求偶的联想；同时，水禽的叫声还让人联想到“君子”的心声。这些联想积聚起来，就使诗歌显得意兴勃发。其次，兴可以烘托气氛，寄托情感。《召南·鹊巢》以“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起兴，喜鹊本是报喜鸟，诗人由其搭巢想到新妇出嫁就很亲切自然；由于鸠鹊在乡间很常见，以鸠鹊起兴给诗歌增添了田园村野气息。第三，兴可以生成意境、和谐音韵。《唐风·扬之水》三章反复用“扬之水，白石凿凿”、“扬之水，白石皓皓”、“扬之水，白石粼粼”起兴，流水白石遂构成一个清新自然的诗歌意境，从而衬托出一对恋人出奔后的畅快心情。兴词采用一唱三叹的方式，具有音韵回旋、反复强调的艺术效果。

古人已经注意到了赋比兴可以联用，例如《王风·黍离》第一章：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首句既是以黍稷起兴，又是直叙眼前景象，因而朱熹称“赋而兴也”。《郑风·扬之水》以“扬之水，不流束楚”起兴，写夫妻只要情深意重，就如柴捆难被流水冲走，这不妨看成是“兴而比也”。

三种手法的联用与互渗，使古典诗歌的意蕴显得深广灵动，也给后人解诗提供了广阔空间。从艺术影响来看，“赋”主张直叙其事，真切具体，它不仅为后世的“诗史”写作开了先河，而且为铺张夸饰的赋体文章提供了诗学依据。“比”为诗歌引入了新颖鲜活的意象，使古典诗歌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喻象系统。“兴”对古典诗歌理论的影响十分深远，人们常用“感兴”、“兴寄”来进行诗歌鉴赏与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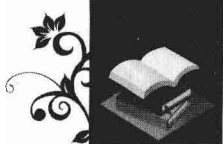
四

国风以抒情诗为主，但它并非不善叙事。除了赋的手法本身与叙事相关外，它还在叙述人称、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作了不少成功尝试。在上古时期，历史纪事尚处于草创阶段，就是稍后的《春秋》编年史也相当简略，因而国风的叙事艺术具有筚路蓝缕(也作萆路蓝缕)的开创意义。

国风的叙述人称是灵活多样的，诗人根据叙事内容和抒情需要，灵活采用第一、第三人称叙述，有的诗还具有历史纪事的痕迹。例如《邶风·击鼓》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写人物参加练兵、南下打仗、战马走失诸事，最后抒发了“不我活兮”的惨痛心情。

《郑风·溱洧》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写士人与女子相约溱水洧水之滨，“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注：勺药后来写作芍药)诗人是事件的观察者，诗中流露出明显的欣赏情绪。

《邶风·定之方中》是以诗述史，记卫文公迁徙楚丘后发展生产、敬教劝学诸事，作者是从士大夫立场来记述历史的。由于叙述人总要从特定角度来观察、描述对象，因而人称与



视角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七月》中有“同我父子”、“嗟我父子”的句子，诗人显然是“农夫”中的一员，他记述一年到头的农事活动与切身感受，具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叙事特点。

国风的叙事结构已显露出艺术构思的痕迹。在叙事线索的设计上，有的诗以时间为线索，如《七月》；有的诗以事情经过为线索，如《氓》；有的诗以空间为线索，如《邶风·简兮》叙述女子观看万舞的过程，从面涂赭色的舞师“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写到观舞女子油然而生的“云谁之思”。在情节处理上，诗人善于通过特殊的细节来表现人物性格，例如《郑风·大叔于田》叙述打猎场面，叔驾着马车冲进林藪，他徒手搏虎，放火拦兽，箭不虚发，归来从容自若，从而给人物、事件抹上了一层传奇浪漫色彩。正如很多古代作品都有重复结构一样，国风也常使用重复结构，如《邶风·北门》重复叙述小吏受“室人”折磨，两章内容大体相似；《黄鸟》三章写秦国用“三良”殉葬事，重复叙述人物“临其穴，惴惴其栗”，三人殉葬就叙述了三次，从而强调了事件的残酷，渲染了诗人的哀痛，也便于记诵传唱。

国风的人物塑造是比较成功的，特别是对女性的塑造，它通过强烈的情感表现，着力塑造了抒情女主人公的自我形象，如《召南·行露》中女主人公刚烈、坚强，《氓》的女主人公多情、哀怨，《狡童》的女主人公天真、痴情。在艺术处理上，作品还开创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写人叙事方式。首先，使用直接的肖像描写、间接的烘托映衬。《硕人》以直接的肖像描写为主，显得浓墨重彩。《桃夭》没有正面写新嫁娘的外貌，但反复使用桃花意象将其间接地烘托出来。其次，引入人物之间的情景对话。例如《女曰鸡鸣》主要由夫妻对话构成，《魏风·陟岵》三章用“父曰”、“母曰”、“兄曰”，写一家人对征夫的反复叮咛。最后，在戏剧性场面中表现人物心理。例如《邶风·静女》写小伙子与姑娘在城墙根约会，她却顽皮地躲起来，急得小伙子“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见面后姑娘送他一枚“彤管”，他马上就高兴起来。

国风诗的叙事艺术为后世诗歌所继承，循着它开辟的道路，汉代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唐代有杜甫的“三吏”、“三别”，言事与抒情遂成为古典诗歌内容的并峙双峰。此外，国风在诗歌音韵、句式上也有重要的开创性。更早的古歌是二言诗，如“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而《诗经》则以四言为主，这就扩展了句子长度，增加了抒情叙事容量。在使用整齐的四言句的同时，国风中也有五言句，如“胡为乎株林”；六言句，如“殆及公子同归”；七言句，如“二之日凿冰冲冲”；八言句，如“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骚体句，如“十亩之间兮”。句式变化使抒情叙事更加灵活，并为后世诗体的演变提供了借鉴。

【思考与练习】

1. 如何认识国风的历史价值与民俗价值？
2. 国风诗是如何使用赋比兴手法的？
3. 国风诗的叙事艺术成就有哪些？





第二节 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公元前 145—前 87? 年)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文学史上也占有独特地位。这部巨著全面叙述了我国上古(黄帝)至汉初(汉武帝)近三千年的历史,具有举世公认的史学价值;同时,由于司马迁精通历史叙事,对人物和重大事件有深刻理解,且笔端常带感情,因而《史记》又有高度的文学价值,鲁迅先生赞誉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①。

一

《史记》是一部通史,全书共 130 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约 52 万字。“本纪”是全书总纲,主要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是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是各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也是全书叙事的脉络和补充;“书”记述制度发展,类似后世的专门科学史;“世家”主要记载诸侯国之事;“列传”主要记载除帝王诸侯外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重要人物的事迹,另有少数列传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主统治的历史。《史记》正是通过这五种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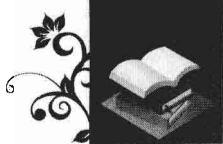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表明了写《史记》的基本意图,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是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是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而“成一家之言”就是借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作者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政治主张、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以及对道德标准和个人价值进行的颇具个性的评判。

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卷帙中,《史记》是一座不朽的丰碑。它之所以能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是因为它同时具有史学和文学价值。如果说史学价值主要是为人物传记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真实感的话,那么文学价值则主要表现在生动的人物描写、精彩的场面描绘、传神的叙述语言、丰富的情感蕴涵等方面,从而对传统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司马迁出生于史官家庭。其父司马谈,汉初为五大夫,汉武帝时任太史令,著有《论六家要旨》,通阴阳、儒、墨、名、法、道诸家。司马迁自幼聪慧,“年十岁则诵古文”,后随著名经学家董仲舒、孔安国研习《春秋公羊传》和《古文尚书》。他博览群书,上自三代典籍,下至西汉辞赋都有所涉猎。约二十岁时,他漫游了全国的名山大川,

^①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不久被擢为郎中，并常随汉武帝巡幸各地。这些经历让司马迁产生了对个人、家国、人世百态的许多独立而深刻的思考。影响司马迁一生的重大事件是“李陵之祸”，由于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他受到了残酷的“宫刑”。这一惨痛经历加深了他对统治阶级的认识，也坚定了他“发愤著书”的决心。

司马迁著述《史记》的动机主要有三：一是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二是继承《春秋》精神，“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三是肩负史家职责，秉承先人传统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这是时代和社会赋予他的义不容辞的使命。《史记》得以产生，也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秦朝已实现了“书同文”，这就为历史记述提供了便利。汉武帝时经济发展、政权稳固、文化学术繁荣，汉朝废除了禁止私人收藏图书的法令，建立了国家图书馆(石室金匱)。这些都为司马迁著述《史记》创造了条件。

就史学价值而言，《史记》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主要表现在历史编纂学和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两个方面。首先，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司马迁在继承前人述史体例的基础上，开创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作为第一部囊括古今中外的“百科全书”，《史记》全面记述了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民族、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取材广泛，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深刻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其次，在立意及选材方面，《史记》充分体现了作者颇具先锋性的史学思想，即秉笔直书，忠于史实，不溢美不隐恶，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正因为这种实录精神，《史记》才以信史闻名于世。而且，司马迁极为强调人的历史作用，体现了他的以人为本的述史观，表现出他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高度重视，这种思想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从学科归属上说，历史学和文学都属于人文科学，都考察人的精神活动和生存意义，但侧重面有所不同。就学科性质来说，历史学兼具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特征，而文学则偏重审美特性；就研究对象和意义而言，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重在求真，而文学却可以从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等多方面进行研究，兼具真、善、美等多方面的追求。《史记》的历史构成了文本的素材，若抽离历史，文学将成为无本之木；而各种文学手法的运用又让历史不再是一副苍白冰冷的面孔而显得生动活泼。因此，不应孤立看待《史记》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而应注意它们互为表里的交叉关系。

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史记》要比最早的欧洲传记文学几乎早产生两个世纪。过去西方人以欧洲为中心，称古罗马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0?年)，著有《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该书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他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不难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公元32—92年)晚生14年，与司马迁相比则晚生191年。

《史记》既是一部纪传史，又是一部传记文学集。它开创了传记文学的先河，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多种写作可能性。它继《离骚》之后，把我国的散文艺术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因此，唐宋古文家无不标举《史记》为典范，明清古文家无不熟读《史记》。





三

《史记》是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框架结构，它贯古通今，具有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卷(或图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的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体现了司马迁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极高的驾驭能力和独特的叙事才能。总的来说，司马迁的述史叙事才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合乎逻辑原则。在体例选择上，因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帝王侯，本应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司马迁却做了不同的安排，如西汉惠帝虽当了几年天子，实则有权无实权，没起什么历史作用，故本纪中没有他的位置；项羽、吕后虽无天子称号，然而一个是秦汉之际主宰天下的人物，一个是惠帝时期发号施令的实权在握者，因此被列入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皆因他们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此等安排看似和体例有所抵牾，实则充分尊重史实，合乎逻辑，可谓匠心独具。在处理材料时，司马迁是略古详今的，例如十二本纪里，将五帝合为一篇；写到夏、商、周时各写一篇，比《五帝本纪》详细；写秦朝时不仅写了《秦本纪》，还写了《秦始皇本纪》；汉代则是一个皇帝一篇，而吕后也占一篇。这并非他薄古厚今，而是因为年代越近，史料越完备，也越易辨真伪，驾轻就熟。《史记》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间的内在联系，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例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因此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而把《匈奴列传》插在《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这两个人物传记中间，因这两个人和匈奴有关系，所以有意识地按人物事件关系编排。

第二，两相呼应原则。《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同样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意义。所谓“互见法”，指的是在一篇传记中表现某一人物的主要经历和性格特征，而他的一些不宜在本传中叙述的材料，则安排到别人传记中去描述，这就是苏洵所说的“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的方法。如《秦始皇本纪》云：“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吕不韦列传》则说：“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表面看来，秦始皇为何人之子，两传的记载有矛盾。其实，司马迁是用互见法来阐明观点的：本纪为秦始皇进行表面回护，说明其名为嬴氏，而列传里则记其实，说明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互见法”可以很好地实现人物形象的统一性，且能忠于史实。这种详此略彼、互为补充的多视角叙述方式，使人物形象显得十分丰满，呼之欲出。

第三，寓论断于叙事原则。《史记》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出现，其中或写作者对人物的评价，或记录收集资料的过程。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登场表示看法(仍



以评论题材、人物性格及其行事为主)。司马迁主要通过历史事件、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来体现自己的感情倾向。例如《刘敬叔孙通列传》，史家对叔孙通性格并没有正面论断，而是通过他人之口来评价。学生说：“先生何言之谀也”；两鲁生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刘邦嘉许：“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诸生骂：“专言大滑”，并讽刺说：“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四次评价是出自他人之口的论断，它使得司马迁的鄙薄之情和叔孙通面谀得势的嘴脸跃然纸上。这种客观叙事和主观表达互为表里，通过人物行为让结论自然浮出的写法，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也能在了解并评议时与作者形成二次对话。

四

《史记》中的人物众多，类型丰富，个性鲜明。虽然是写历史人物，但司马迁以传神之笔，勾勒出一个个栩栩如生、风采各异的人物画像，举凡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士人食客、先秦诸子、刺客游侠以及商贾、医卜、俳优等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无异于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原型宝库，从而对后世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史记》中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它往往在重大事件和矛盾冲突中表现历史人物，这就为后代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素材。据不完全统计，元代杂剧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 180 多种，现存的 132 种元杂剧中有 16 种就采自《史记》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在京剧中则有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丰满，个性独特，并具有其自身的矛盾性。人物性格中的种种对立因素不仅没有削弱人物的真实性，反而合情合理地表现了人性的多面性，这体现了作者的观察入微和客观公正的态度。如自诩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有种种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仍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第一个抗秦暴政的陈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时，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人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正是这种个性与矛盾性的展现，让复杂的人物性格因多维透视而旁见侧出，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了《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使得《史记》洋溢着浪漫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如果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的人物传记合起来读，极像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

司马迁描写人物时，不是静态地取景，而是把人物置身于历史变迁中动态地看待，甚至刻意通过人物命运的巨大落差来表现人与环境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多面性。如写韩信曾受过“胯下之辱”，后来却建功立业、烜赫一时；在写某些未得善终的大人物时，刻意描画他们在得志时的骄横恣肆如项羽、李斯、田横等。在这些历史变迁背后，史家还充分暴露了势利、报复心理等人性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在微贱时受到家人薄待，建功立业后刘邦仍不肯忘记把他们羞辱一番；身先士卒的“飞将军”李广只因免职时曾受霸陵尉轻慢，复职后就借故杀了霸陵尉。这种一分为二看待历史人物的方法，显示出司马迁不偏不倚的立场。

